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

第三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

第三册

湖北财经学院经济研究所 编写
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室
侯厚吉 吴其敬 主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4年·哈尔滨

责任编辑：王辉生 周学俭

封面设计：王祖珍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
Zhongguo Jindai Jingji Sixiang Shigao

第三册

侯厚吉 吴其敬 主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13 6/16·插页4·字数320,000

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统一书号：4093·109

定价：2.40元

说 明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第三册,包括的历史时期是:自1905年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成立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

本册由湖北财经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室集体编写。侯厚吉、吴其敬同志任主编。参加执笔和定稿的有侯厚吉、吴其敬、杨堪、张家骧四位同志。

本书有缺点和错误之处,恳切希望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1983年12月

目 录

第三编(1905—1919年)

第一章 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社会和对外关系	1
第二章 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经济思想	17
第一节 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经济思想综述	17
第二节 孙中山的经济思想	54
一、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	54
二、民生史观与经济范畴理论	61
三、民生主义的基本内容与基本特征	77
四、“平均地权”思想	83
五、“节制资本”思想	99
六、振兴实业思想	108
七、钱币革命论	119
第三节 朱执信的经济思想	136
一、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激进思想家朱执信	136
二、社会革命思想	146
三、“理想地区”方案	161
四、货币思想	165
第四节 廖仲恺的经济思想	181
一、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廖仲恺	181
二、生产与消费及人口观点	188
三、平均地权思想	200

四、货物本位论	206
第五节 章太炎的经济思想	220
一、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思想的章太炎	220
二、“均田”与“限田”论	232
三、工商观点	241
四、财政金融观点	252
第三章 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经济思想	265
第一节 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综述	265
第二节 梁启超的经济思想	277
一、资产阶级改良派宣传家、西方资产阶级文化 学术思想的传播者梁启超	277
二、戊戌变法时期振兴农工商的思想	288
三、“生利分利”论	299
四、发展大资本企业的思想	309
五、反对土地国有的思想	317
六、货币思想	322
七、国债论	339
第三节 张謇的经济思想	356
一、资产阶级实业家、立宪派领袖人物张謇	356
二、农工商关系论	362
三、“棉铁主义”	368
第四章 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买办官僚的经济思想	385
一、买办官僚经济活动的特点及其经济思想的实质	385
二、兴办实业的垄断和买办思想	394
三、财政观点	409
四、货币与银行观点	421

第三编 (1905—1919 年)

第 一 章

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 社会和对外关系

从 1905 年中国革命同盟会成立到 1919 年五四运动前夕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第三个时期。从二十世纪开始到辛亥革命前夕，我国社会经济、阶级关系以及对外关系又有新的发展变化。这些发展变化比较重要的有：帝国主义从政治上、经济上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统治，腐朽反动的清政府进一步投靠帝国主义而成为“洋人的朝廷”，在原来洋务派官僚资本和社会上买办资本势力的基础上，产生了早期买办官僚资本主义和早期买办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本主义在本时期中得到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经济实力有一定的增强，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力量也随着资本主义中小企业的增加而扩大；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帝国主义在华开设厂矿的增加及官僚资本企业的发展，无产阶级队伍更加壮大了；在这种经济、阶级关系新变化的基础上，出现了中国近代的第三次革命高潮，爆发了辛亥革命。和以上经济、阶级关系的变化及革命形势的发展相适应，本时期的经济思想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在二十世纪初，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形

势的发展和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思潮的兴起，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经济思想取代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而成为当时主要的进步经济思潮。资产阶级改良派（辛亥革命前又称立宪派）经济思想在本时期继续存在并有一定影响。原来洋务派的经济思想，也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逐步演变成早期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经济思想。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和改良派的经济思想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不同阶层的利益，同早期官僚资产阶级经济思想是对立的。与此同时，由于革命民主派与改良派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的不同阶层的利益，所以两派经济思想既有一致之处，又存在着分歧，甚至发生论战。以上三个派别经济思想的演变及斗争，构成了本时期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

从二十世纪开始，帝国主义对华的侵略，同甲午中日战争后的几年相比，又加强了。1901年《辛丑和约》签订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进一步投靠帝国主义，发布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上谕，继续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甘心充当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堕落成“洋人的朝廷”。帝国主义在原来《马关条约》的基础上，又利用《辛丑和约》以来所攫取的新特权，从政治上、军事上加强对清政府的控制，从经济上加紧对中国的掠夺。《马关条约》以后，帝国主义已加强了对华的资本输出，《辛丑和约》之后，列强对华的资本输出，更是迅速增加。以厂矿投资总额为例，从1896年到1900年外国资本在华设立的厂矿共29家，总投资额为两千四百二十六万余元，从1901年到1911年在华设立的厂矿为91家，总投资额为七千三百九十六万余元。这十一年间的投资额比《马关条约》签订后的五年约增加了三倍。

投资于矿业，夺取开矿权是帝国主义对华输出资本的重要目标之一。在1902年到1903年间，英、美、日等国强迫清廷签订

新的《通商行船条约》。在这些不平等条约中，除规定增开商埠、扩大内河航行权等条款外，还明文规定：“招徕华洋资本兴办矿业”，准许外商“在中国地方开办矿务”。与此相应，清政府在1902年和1904年制定的《筹办矿务章程》、《矿务暂行章程》中，也明文规定准许“洋人承办”矿务。清政府甚至公开宣称：“矿商之利，外人不妨共之。”根据这些不平等条约及清王朝的法令，帝国主义很快就霸占了我国绝大部分地区的重要矿藏。以煤矿业为例，帝国主义（包括中外合资）在1906年的投资额达二千三百六十万余元，占全国煤矿投资总额的百分之八十四点八，到1913年则上升为八千五百三十七万余元，占全国总投资额的百分之七十九点六。象开滦、本溪、抚顺、焦作等规模较大的煤矿企业，都先后落入外人之手。至于机械开采的铁矿业，在这十几年间，百分之百的为列强所控制。

铁路修筑权更是列强争夺的主要目标。《马关条约》签订后，各国已展开争夺筑路权的斗争。到二十世纪初，东北的东清和南满铁路，已分别由俄国和日本直接经营，山东的胶济铁路由德人直接经营，滇越铁路则由法国人直接经营，正太、汴洛、沪宁等线，也为外国势力所控制。此外，日、美、德等国还为夺取福建、浙江、江西等省的筑路权而角逐。攫取铁路修筑权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重要手段，当时就有人指出这是“灭国新法”之一，而铁路贷款，又是列强借以攫取路权的重要手段。如沪杭甬铁路就是因借款为英国所操纵；美、法、英、德等国还企图利用贷款来掌握粤汉、川汉铁路。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铁路修筑权不断为外国所攫取（许多铁路的实际修筑是在1900年以后），形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从而成为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清朝廷进行斗争的重要内容。

帝国主义各国在华的工业投资，在二十世纪初，也继续增加。

如棉纺织业,从1896年到1900年,外国资本在中国兴办了五个厂,资本为六百二十万元。从1901年到1911年又陆续办起九个厂,资本总额共为四百九十一万余元。这些外国资本的纱厂,在上海纺织业中占绝对优势,并且几乎占全国的一半。又如烟草工业,1902年成立的英美烟公司,在十年中,资本由十万五千元增至一千一百万元,超过当时中国所有烟厂总资本额的七倍。

沿海和内河轮船航运业,也几乎为外国公司所垄断。以吨位计算,1877年,进出于各通商口岸的轮船,外轮为六百七十二万吨,中国轮船为四百万吨。到1907年,外轮吨位增至六千二百多万吨,中国轮船则为一千一百多万吨,外轮占总吨位的百分之八十四点四,中国轮船只占百分之十五点六。

为适应帝国主义对华输出资本和进一步控制中国财政金融命脉的需要,外国资本在中国又增设了许多银行。如果说在甲午中日战争前,外国资本在中国设立的银行,势力还不太大,那么甲午中日战争以后,特别是二十世纪以后,情况就不同了。从甲午战后到1913年,列强又在中国增设十三家银行和八十五个分支机构,加上以前的,共有二十一家银行和一百零一个分支机构。为了加强对中国金融的控制和掠夺,列强又进而在中国建立国际银行团。最初是1909年7月由英、德、法三国组成的银行团,1910年因美国加入而成为四国银行团,1912年日、俄加入则成为六国银行团(1913年因美国退出而为五国银行团)。这种银行团是帝国主义强权外交和金融资本相结合的组织形式,是列强合伙侵华的新形式。它不仅通过贷款加强对清廷及北洋政府财政金融的控制,并且还利用其雄厚的金融实力来左右中国社会经济和政局。

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加强,给中国社会经济进一步带来严重的后果。一、加深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使它在财政经济上更加依赖于外国。除了海关关税早已为外人控制外,盐税以及某些省

分的厘金，也逐步为外人所控制，清王朝及后来的北洋政府又陆续地丧失了很大一部分财政主权。二、加重了币制的混乱。清朝廷为了支付赔款及外债本息，应付财政困难，除用增加税捐等措施在国内加紧搜刮之外，还滥铸铜元，滥发官钱票，使币制愈加混乱。而外人在华设立的银行，也利用其有利条件，在中国发行纸币，使金融货币混乱的情况进一步恶化。因此，在二十世纪初，改革币制，建立货币本位制就成为许多人关心的一个重要经济课题。三、促进了金融危机的发展。由于外国资本对中国金融的垄断和操纵，在辛亥革命前，一再发生金融风潮。1909年，国内发生金融风潮三起，1910年发生八起，1911年上半年又有五起，使民族工商业遭受严重打击。四、使中国社会经济更加凋敝。在二十世纪初，因支付赔款和外债的本息以及外人在华企业的赢利和对华的商品输出等项，帝国主义一年从中国掠夺所得超过了二亿元。这就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社会经济，造成上下交困的局面。在列强的侵略下，中国更加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为了恢复国家的独立，维护民族的权益，中国人民继续开展包括收回利权的各种反帝斗争。

在二十世纪的头二十年中，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继续有所发展。其所以如此，有多方面的原因。第一，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投资扩张，从根本上说是不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的生存和发展的；但是另一方面，在客观上也给予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以一定的刺激。第二，清政府在日趋严重的统治危机与财政危机的形势下，为了抵制革命，争取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支持，对他们作了一些让步，颁布了《商会简明章程》、《奖励公司章程》、《公司律》、《华商办理农工商实业爵赏章程》等法令，承认民族资产阶级有兴办和发展近代企业的权利，做出奖励实业的姿态。第三，在帝国主义加强对中国经济掠夺的情况下，国内有些人继续宣传“实业救国”论，把兴

办企业看成抵制外国侵略，振兴中国的一个重要途径。第四，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斗争（如抵制美货运动），也为本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第五，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战争，为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时机。如1904年到1905年的日俄战争，除了日、俄双方集中力量于战争外，英、美等国因以大量的物资和财政支援日本，对中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压力也有所减轻。又如1914年到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列强忙于战争，对中国的经济压力也有所放松。由于这些原因，在本历史时期中，中国资本主义曾两次出现较大发展的形势。一次是1905年到1908年间，在这四年间，国内民族资本共设立厂矿二百二十家，资本总额达七千三百九十余万元。中国近代几家规模较大的纱厂（如大生纱厂二厂）都创办于此时。另一次是1914年到1918年，这是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发展的高潮。如1903年到1908年，每年平均注册的工厂为二十一点一家，1913年到1915年，年平均注册厂数则上升为四十一家，1916年到1919年又增为一百二十四点六家。投资额也大大增加了，如1917年，工业投资额达一亿二千八百二十四万余元，大大超过了1905年到1908年的四年总投资额。

和民族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发展相伴随，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经济力量有较大加强，社会地位也得到提高，在辛亥革命前的立宪运动与保路运动中发生较大的影响，成为清朝末年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由于资产阶级上层是同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有较多联系的一部分人，他们害怕革命，害怕群众的革命斗争会损害他们的地位和财产利益，因而力图使同帝国主义及封建主义的斗争带上温和的色彩。这样他们就和代表资产阶级中、下层的革命民主派发生了分歧。

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力量也有一定的发展。例如1905年到

1906年间，由于日俄战争和抵制美货运动，使民族资本经营的中小企业乘机得到发展。据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正月二十六日的《时报》刊载：扬州“城内所设之机器手工织厂，去岁年终，已不下四十余处”。这里报导的虽是扬州一地，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小企业的发展情况。这时新兴办的民族资本主义中小企业，除一些规模较小的机器工厂外，大量的的是生产火柴、皂烛、卷烟等新的手工工场。这些中小资本家，经济力量虽不强，但人数比较多，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重要社会基础。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和上层相比，同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联系较少，受后两者的压迫也较深，所以具有比资产阶级上层强烈的革命要求。他们当中有的人还直接参加了革命运动，如为革命而献身的湖南志士禹之谟，就是一个手工工场主。

1901年后，和废科举、办新式学堂、派留学生相伴随，中国出现了一个新式知识分子群，而且人数不断增加。例如，去日本的留学生，1900年只有七、八十人，到1905年则增加到八千人左右。在这些知识分子中，除一部分人为清王朝及帝国主义服务之外，许多人都具有爱国心，在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及自然科学之后，纷纷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成为辛亥革命的一股重要力量。对此，清政府曾惊呼：“东京留学生已尽化为革命党，不可不加防备。”

在本时期中，还产生了早期买办官僚资本主义和早期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在二十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对华商品输出的扩大，特别是对华投资的迅速增加，社会上直接为帝国主义效劳的买办势力发展很快，他们的队伍迅速扩大，财富急剧增加，出现了一批拥有巨额资财的大买办和买办家族。在这样的基础上，他们还建立了组织，操纵各城市的工商金融业和工商界，并且进一步渗入政权。他们对北洋军阀官僚，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至于原

洋务派的封建官僚军阀，在这一期间则逐渐向买办官僚资本家转化，盛宣怀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盛氏买办官僚家族在本时期的发展主要通过以下方式来实现：一、进一步勾结帝国主义，靠办理外债，出卖路矿权而增加财富。如盛宣怀利用所掌管的汉、冶、萍厂矿（1908年组成一个公司），一再向日本借债，出卖利权而个人牟利。又如1911年，他以邮传部尚书身分，帮助清政府推行铁路国有政策，将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并以之向帝国主义抵押借款，他本人也从中得到好处。二、他们占有近代企业的手段，除凭借政治权势外，还更多地使用经济手段，其主要方式之一就是通过捞取大量股票来控制企业，这样就可以使他们不因官职的得失而影响对企业的控制。三、他们占有的财富的价值，属于近代企业的部分已超过了土地的部分，据估计盛宣怀在轮船招商局、通商银行等五个企业的投资达一千万元以上。而且在社会上，这个家族越来越多地以企业界的巨子出现。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他们谋求逐步地建立起垄断资本体系。这些活动与事实说明，盛氏家族已日益成为早期买办官僚资本家。

曾任袁世凯反动政府财政总长的周学熙，也利用政治权力，发展其官僚资本势力。从1906年以后的十几年间，周学熙陆续开办了一些企业，成为在华北具有相当实力的一个官僚资本集团。又如旧交通系头子梁士诒，也是利用政治权力而发财致富，他除据有中国、交通等银行外，还创办了新华储蓄银行及其他企业，成为颇有实力的另一官僚资本集团。其他一些北洋军阀、官僚，也都运用搜刮、受贿以及通过购买军火、借款得到回佣等手段攫取大量财富。他们除将一部分资财用于圈购田地、房地产之外，还将相当大的一部分投资于银行与工矿企业，发展买办官僚资本。如直系军阀冯国璋就拥有直隶夹山、遵化、兴隆沟三处金矿，并投资于大陆银行；皖系军阀段祺瑞则是龙烟煤铁公司的大股东。

这样一来，这些军阀官僚也日益成为买办官僚资本家。上述两种力量的互相渗透和结合，就产生了早期买办官僚资产阶级，成为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社会中的一股反动社会势力，成为帝国主义继续统治中国的重要社会支柱。

随着上述政治、经济、阶级关系的变化，在本历史时期中，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也有了新的发展。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在中外反动势力的镇压之下失败了，但人民群众的反清反帝斗争并没有停息。如1902年，直隶发生了以“扫清灭洋”为号召的景廷宾起义；四川巴县一带群众则揭出“灭清剿洋兴汉”的旗帜。1903年，又有广西会党起义。其他地方的抗捐抗税的斗争也接二连三地发生。

除了农村人民群众的自发反抗斗争外，城市各阶层的反帝爱国运动也在发展。1903年，沙俄军队盘据东北拒不撤退，引起我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于是在京、沪、汉等地爆发了拒俄运动。在日本的我国留学生还组织了“拒俄义勇队”，要求出兵拒俄。1905年，因美帝国主义虐待华工，迫害华侨和不肯废除期满的限制华工的条约，引起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抵制美货运动。此外，从1903年起，各阶层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控制我国矿山、铁路的收回利权运动，也逐步地开展起来。

这些爱国运动给予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一定的打击，显示了我国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民族资产阶级随着自身力量的发展，也积极地投入了这些爱国的运动。但是这些正义的反帝爱国活动，却遭到清政府的破坏和镇压。如拒俄运动发生后，清廷诬蔑留日学生的活动是“反叛朝廷”，密谕各地督抚，如果捕获，可“就地正法”。抵制美货运动发生后，清政府慑于美帝国主义的压力，下诏宣称：民间禁用美货“有碍邦交”，指示各省督抚“从严查究，以弭隐患”。清政府的这些倒行逆施，使许多爱国志士切身体会到在清

王朝腐朽统治之下，是爱国有罪，救国无路，进一步认识到要救国，必须推翻清王朝，从而转向革命。

伴随着民族斗争、阶级斗争的新发展，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思潮也较快地在社会中传播。不平等的《辛丑和约》签订后，一些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刊物，如《开智录》、《国民报》、《浙江潮》、《湖北学生界》（后改名《汉声》）、《游学译编》、《江苏》、《苏报》、《童子世界》、《女子世界》等陆续出现并流传于各地。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等书籍也相继出版。到《民报》创刊前后，宣传革命的书刊已不下一百二三十种。

在革命思潮日趋高涨，中国人民反清的情绪日益强烈的条件下，一些有志革命救国的人士，着手组织革命团体。除孙中山于1894年建立的兴中会之外，1904年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组织了华兴会；张难先、刘静庵等在武昌成立科学补习所；陶成章、蔡元培、龚宝铨等则在上海成立光复会。此外，还有福建学生会、江西自强会等革命小团体的出现。

为了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及其他革命团体决定联合，于1905年8月成立了中国革命同盟会，推孙中山为总理，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并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号召。同盟会的建立，将分散的地方革命团体联合起来而成为全国性的资产阶级政党，使全国革命力量有了一个中心，有力地推动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发展。

为了更好地宣传革命思想，1905年10月，同盟会创办了机关报《民报》，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将上述的十六字政治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三民主义。孙中山所提出的三民主义学说，是他组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指导思想。对于统一革命党人的思想，指导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发

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当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积极组织反清的革命活动的时候，资产阶级改良派也按照自己的主张开展政治活动。由于他们坚持改良立宪，反对革命，因此，在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和改良派之间展开了一场重要的论战。这场论战由1902年康有为发表《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等文章，攻击革命民主派，章太炎作《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进行反驳而拉开序幕。到1906年，论战进一步公开化。同盟会在《民报》第三号号外，列举了两派在十二个问题上的根本分歧，但论战主要是以下列三个基本问题为中心而展开。一、要不要用暴力革命推翻清王朝。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反对暴力革命，认为暴力革命将破坏社会秩序，甚至招致外国的干涉，因而坚持政治改革只能用“要求”、“劝告”的方式去敦促清政府进行改革，实行立宪。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则指出，中国社会的“内乱”是清政府的倒行逆施所引起的，中国被瓜分的危机也是清朝腐朽统治所造成的。因此，只有革命才能创立新的社会秩序，只有革命才能使“瓜分之途塞”，只有革命，才是“救人世之圣药”。二、是共和立宪还是君主立宪。资产阶级改良派认为，君主专制、开明专制、君主立宪、共和立宪等四个阶段，应循序而行，不能躐等。所以如此，在于中国民智未开，中国人“尚未有共和国民之资格”。革命派则认为，梁启超等所称颂的皇帝大臣，都是一国中“至不才至无耻之人”，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立宪的能力，中国人决不比欧美各国人低劣，所以应寄希望于人民，即使要开民智，也应革命开之。革命派还以“天赋人权”论为根据，指出在共和政府之下，人民会逐步养成实行民主政治的能力，由此而强调，中国只有兴民权，改民主，才有出路。三、要不要实行平均地权，实行土地国有化。梁启超坚